

一个文学编辑的评论与随笔



曹元勇

著

聚焦与印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一个文学编辑的评论与随笔

曹元勇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聚焦与印象/曹元勇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520-1023-7

I. ①聚… II. ①曹…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5324 号

聚焦与印象

著 者: 曹元勇

责任编辑: 缪宏才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1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023-7/I·168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穆时英：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作家 3

穆旦：历史迷雾中的孤岛 24

走在现代汉诗写作的最前沿

——《蛇的诱惑》编后记 29

穆旦诗中的守夜人 36

双重指向的审视与批判

——贯穿穆旦诗歌写作的主题 53

汉语新诗中的自我与抒情主体 86

第二辑

谦卑的小说家莫言 97

审视内心深处的罪

——读莫言的小说《蛙》 101

《蛙》的叙事和人物	106
讲故事的人走进诺贝尔奖殿堂	115
安宁之国的文化盛典 ——2012年诺贝尔奖活动周纪实	121
“他可以描写真正的人” ——与法国翻译家谈莫言和文学	150
莫言作品的几个高峰 ——采访日本翻译家吉田富夫	177

第三辑

逃亡/还乡

——苏童早期小说的主题变奏	207
---------------------	-----

永恒的慰藉

——读长篇小说《一岁等于一生》	211
-----------------------	-----

“梦”的收集者	213
---------------	-----

乡村姑娘的爱情	217
---------------	-----

在张爱玲之外写作

——读长篇小说《时钟里的女人》	220
-----------------------	-----

须兰的阳光	224
-------------	-----

中国人也能写好推理小说	244
-------------------	-----

人人都是“卧底”的《十面埋伏》	248
-----------------------	-----

纯正的精神读物

——残雪解读卡夫卡	251
-----------------	-----

小说之目看世界	256
穿越死亡的丛林	
——恐怖大王和他的恐怖小说	260

第四辑

现实中的噩梦	
——2006年首部重量级长篇小说《丁庄梦》	273
不能承受的现实之重	276
女作家笔下的温暖与冷酷	279
非虚构的和平饭店	
——读陈丹燕的《成为和平饭店》	282
呈现一个开放的整体世界	
——谈雪漠长篇小说《野狐岭》	287
从丽娃河到“江南三部曲”	293
印象点评五则	297
中国后现代先锋小说的本体特征	303
生态意识中的家园、体验与求索	320
“未出师门者”的追忆	333
一个文学编辑的信念	339
后记	342

第一辑

穆时英：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作家

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文坛上崛起的先锋小说几经嬗变，已逐渐走上自觉探索的轨道，赢得了人们的承认与赞许。然而，把历史的书页向前翻到1930年代，以穆时英为首席作家的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却没有这般幸运。新感觉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具实验性质，和世界文学潮流同步发展的小说流派。由于来自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个流派不仅在当时未能形成一股巨流影响整个文坛的走向，而且在长期的历史中它仍以畸形的姿态孤立于文学史上，遭受着人们的曲解以至糟蹋。就拿穆时英来说，司马长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称他是“垃圾粪土里孤生的一株妖艳花”，吴福辉在《小说鉴赏宝库（中国现代卷）》里说他是“从十里洋场冒出的美丽的菌类：一个堕落的天才”。穆时英真的还要继续被曲解，继续孤寂吗？立足于我们今天的文学观念来看，在现代文学史上，穆时英乃是很少几位困惑于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以关注个体生命为本位而进行创作的作家之一。他曾经以其微薄的力量试图在1930年代的文化背景中挑起一个荒原的痛苦的觉醒，然而历史没有理喻他的声音，最终他只好负着这个荒原的重压而倒下。对于他在文学史中的意义，贴近现实社会以致最后发展成为政

治运动附属物的中国现代文学从来未能予以正视；他死得不明不白的结局（参见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从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人们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在这儿，我想从他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自觉关注切入，尝试为他重新塑像，并希望有所发现。

“忧患”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素来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历史更加促使中国知识分子以忧国忧民为己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必须把对民族命运、社会现实的忧虑与关注置在首位，不然便对不起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便为历史所不齿。这种思想背景深深影响了中国新文学。从诞生之时起，中国新文学就打上了“忧患”的印记，形成一种普遍的功利主义倾向，坚信自己对中国社会负着重要的责任。这样，从一开始，新文学便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整个社会的现实与前途、整个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方面，而对于具体个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则往往无暇顾及。1930年代，新文学的这种主导倾向已渐渐成为一种超越于个体经验之上的时代精神，融入了历史的“合理性”发展之中。就是在这种时代文化大背景中，穆时英脱颖而出，以其年轻又敏感的生命，唱着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异音”，闯进文坛。

穆时英（1912—1940），十七岁开始文学创作，二十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南北极》，引起文坛重视。在这个集子里，他用惊人的畅达跳跃、绝少知识分子气的口语，表现了很少为人注意的城市

下层流民的生存状态，宣泄了一种狂暴的不满现实的“破坏”（而非“反抗”）情绪。重视作品的社会功效的左翼评论家对这个集子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一时间，《南北极》被看作是“普罗小说”的新崛起，穆时英也俨然成了比较激进的“左翼”作家。针对文学界的这些反响，穆时英在《南北极》再版时写了一篇《改定本题记》，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并透露了自己与时代文学主流相背离的思想。他在这篇题记中写道：

这集子里的几篇不成文章的文章，当时写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试验及锻炼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写的——到现在我写小说的态度还是如此——对于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并不知道，也没想知道过。我所关心的只是“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发表了以后，蒙诸位批评家不弃，把我的意识加以探讨，劝我充实生活，劝我克服意识里的不正确分子，那是我非常感谢的。可是使我衷心感激的却是那些指导我技巧上的缺点的人们。

如果不看写这段文字的作者的姓名与时代，那么这看上去非常像 1950 年代后西方先锋作家和 1980 年代后中国先锋作家常常讲的话语。然而，这却是穆时英在 1933 年就已说出的话，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穆时英在此首先宣布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不涉及功利目的的。这种态度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主流无疑是格格不入、相互抵触的。对于视功利意义高于审美价值、把文学当作干涉现实生活的工具的新文学主流来说，穆时英的创作态度显然是一种反动。他强调说他关心的只是“应该怎么写”的问题，也就是强调了艺术创作中

最本质的一个环节——叙事。他如此强调蕴涵着以下目的，即试图不让人们把他的作品与实际生活经验的世界混为一谈，不让人们从生活经验的多少深浅来品评他的作品之为艺术的优劣。实际上，现代批评家已经向我们证明，艺术与生活经验世界的差异在于形式与技巧，因为我们通常所谈论的艺术的内容是指生活经验，而非艺术自身，只有当我们谈论形式与技巧，即实现了的内容，亦即作为艺术的作品之时，我们才是谈论艺术^①。这个问题在中国新文学主流那里不仅不会受到重视，反而只会遭到批判。所以，穆时英从踏入文学殿堂之时起，所关心的问题就偏离了新文学整体发展的轨道，表现出独立探索的创造精神。鉴于此，他的第二本小说集《公墓》刚一问世，就遭到左翼文学界的同声责难，便在情理之中了；而后来评论界把《南北极》与自《公墓》之后的作品绝然对立起来，并把《南北极》当作一个费解之逃避而不谈，就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抹去两者表层的差别，《南北极》与其他作品在创作追求方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1933年出版的《公墓》是穆时英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由此，他开始了作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的创作生涯。《公墓》里的作品显示了让文坛大吃一惊的变化。《南北极》中的流畅、活泼的原生态口语表述消失不见了，出现在《公墓》里的是刻意雕琢的语言和全力铺张的感觉；《南北极》展现的是城市下层流民的狂暴的破坏冲动，而《公墓》试图在疯狂的雕琢与铺张中展现时代变幻中的个体的生命状态。随着这种表面风格的转变，穆时英把对社会现

① 参见[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实层面的关注撇开，而把目光转向具体的个体，对个体的焦灼不安的内心世界进行挖掘描画。面对这种颇具挑战性的变化，文学界不仅未能冷静地思考它所蕴涵的意义，反而惊呼穆时英“右倾”了，他的作品“全是与生活、与活生生的社会隔绝的东西”。对此，穆时英回答说：“可是，我却就是在我的小说里的社会中生活着的人，里边差不多全部是我亲眼目睹的事。也许是我在梦里过着这种生活。”他在《公墓·自序》中为自己辩解道：

我是比较爽直的坦白的人，我没有一句不可对大众说的话，我不愿像现在许多人那么地把自己的真面目用保护色装饰起来……说我落伍、说我骑墙、说我红萝卜剥了皮，说我什么可以，至少我可以站在世界的顶上，大声地喊：“我是忠实于自己，也忠实于人家的人！”忠实是随便什么社会都需要的！

这简直是一段愤懑而勇敢的宣言，它暗示着穆时英从关注外部世界的热烈行动转向刻意描绘个体内部世界的微妙心理，这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从现实生活中消极退隐，而是基于“忠实于自己”这个原则，这个信念，把这种转变作为一种新的反抗力量来予以处理的。所以，穆时英在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尝试和创新，绝对不是单纯的艺术上的实验，其中深含着不容忽视的现实主义的考虑。中国新文学由于特别地关注社会现实和民族命运而疏忽了对具体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挖掘，它发展到 1930 年代就已不再是焕发着个性力量的滔滔巨流，而演变成为一种空文、一种教条，代表着超越于个体之上的既成经验和文化，以及这种经验与文化对个体的权威

性。在这种背景下，穆时英执着于“忠实于自己”这个信念，根本无法装出一副欢欣鼓舞的样子来忘却时代精神对个体内心世界的逼迫，更无法为这种时代精神而激发起生命的真实热情。他没有像1930年代的其他很多作家如丁玲、蒋光慈、叶紫等那样自觉地投身于新文学主流的怀抱，用冷静的解剖和理性的批判来面对现实社会，而是转向作为个体的单个人的内心世界，愈来愈执着于个体生命的自觉，愈来愈困惑于个体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焦灼迷惘的体验。从小说集《公墓》开始，他的作品自始至终被一种对历史发展的焦灼不安和对个体价值的迷惘情绪所笼罩。他就像一匹迷失在牢笼里的困兽，躁动不安，东奔西突而不知家园之所在。

其实，穆时英对自己在1930年代大背景中的位置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1934年5月的最后一天写下的《白金的女体塑像·自序》中，他对自己作了描画与剖析。他写道：

人生是急行列车，而人并不是舒适地坐在车上眺望风景的假期旅客，却是被强迫着去跟在车后，拼命地追赶列车的职业旅行者。以一个有机的人和一座无机的蒸汽机关车竞走，总有一天会跑得精疲力尽而颓然倒毙在路上的吧！我是在去年突然地被扔在铁轨上，一面回顾着从后面赶上来的，一小时五十公里的急行列车，一面用不熟练的脚奔逃着的、在生命的底线上游移着的行人。二十三年来的精神上的储蓄猛地崩坠了下来，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模糊了起来；于是，像在弥留的人的眼前似的，一想到“再过一秒钟，我就会跌倒在这铁轨上，让列车的钢轮把自己辗成三段的吧！”

时，人间的欢乐、悲哀、烦恼、幻想、希望……全万花筒似的聚散起来，插摇起来。

时代列车踌躇满志地向前奔驰，而穆时英却以年轻的都市人的纤细敏感的触角体会到个体生命状态与时代精神的背离。他不愿做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相脱节的时代精神的顺从者。他在疏忽对个体价值关注的时代背景中孤独地呐喊“我是忠实于良己”的。本着这个坚定的信念，他不惜以“精神上的储蓄”全部崩溃为代价，来表达他对时代精神合理性的怀疑和反抗。所以，他的精神状态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充满目的论色彩的文化偏激心态是背道而驰、难以相容的。具有重要启蒙意义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 1930 年代，影响波及全国各地时，恰恰遗忘了对个体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关怀，缺少了穆时英等人的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文学创作的刺激和疏导。结果，新文学主流没有走到顶峰就迅速陷入几乎停滞的泥沼之中。取巧的理智取代了肉搏的实践，发展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就完全异化为一种空乏的、抽象的政治激情的产物，堕落到令人羞耻的极度虚伪。新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当然早在它诞生时期把功利意义看得高于一切之时就已经植下根源。由此可见，穆时英在 1930 年代的文化氛围中脱颖而出，醒悟到个体应当具有属于自己的真实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并执着地探寻这种价值和意义，就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偶然事件。在执着的探索过程中，穆时英表达出这样一种情绪，即时代文化经验对个体来说是莫名其妙的、外在的东西，其中充满了虚伪、矫饰和不理解，因而个人应该到最低限度的生命状态中寻求真实的感觉体验。但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客观历

史和新文学诞生以来的文化潮流决定了穆时英的这种寻求只能是天方夜谭，其悲剧性结局是无可避免的。

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个体的关注并非始于穆时英。1920年代，郁达夫和丁玲就曾以超人的个性胆识正视并表现过孤独个体的绝叫和苦闷。令人惋惜的是他们没有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探索，在1930年代，他们都迅速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具有功利主义倾向的描写与批判，从而融入新文学的主流之中。穆时英则和他们不一样。穆时英对个体的关注有着全力以赴的执着。他几乎是凭着孤注一掷、死不悔改的精神与勇气，固守着这片荒芜之地。关于穆时英的生平经历，我们知之不多。我们只知道他幼年随父移居上海，在那里读完中学和大学，而且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在那里完成的。所以，我们很难从他的生平经历去剖析他何以会在新文学正蓬勃发展的时候脱颖而出，唱出与时代强音迥然有别的声音。唯一可供我们分析的是他创作的几本小说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推测他在1930年代的心态，因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艺术创作可以说是一种最富于个性的活动，因此不管作家在创作中花多大的力气掩饰自己，他在作品中总是投入了真情，而这真情终究是会表现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作品中解读出来的作家形象更接近真实^①。

由前面一节的分析，我们知道穆时英在对时代文化精神的压迫

^① 参见王晓明《潜流与漩涡》一书中的相关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的反叛中，从理智上展开了对个体生命的自觉的追求。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穆时英身处的现代都市生活节奏的压迫则促使他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深深植根于都市生活中个体的焦灼不安、颓废虚无的心境；而且他之所以能破风气而起的根本原因，恐怕也只有从都市这片独特的土壤出发才能找到。进入 20 世纪以来，伴随着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现代都市逐渐兴起并生成一种屈辱的繁华。由于缺乏历史深度，这种现代都市一直冷寂地徘徊在历次文化热之外。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它无论蕴含着多少进步与文明，也完全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不相符合。生存于这种都市社会中的一个个体犹如漂泊无根的游子，最容易首先从滚滚的时代迷障中被抛离出来，也最容易从生命的最底层体验到作为个体的迷惘、焦灼和压迫感。在 1933 年前后，穆时英便陷入了这样的都市个体的处境。时代列车将他抛在后面，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但同时又不可自制地迷恋、追逐着表面上花花绿绿的都市生活。基于自己的这种真实而锐痛的生命体验，穆时英在创作中始终牢牢地捕捉住了都市社会里个体的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并使之成为对抗与个体经验相脱节的时代精神的有力依据。

从小说集《公墓》开始，穆时英的大部分小说创作就是对生活在现代都市社会而又受其困扰的都市人进行充分表现。这些都市人一方面是沉湎于享受，对都市灯红酒绿的生活表现出难以自拔的依赖，另一方面又被无边的寂寞包围着，时时体味着内心世界的极度空虚与无聊。他们总是在饮鸩止渴般地追求一时的欢乐中消耗着丧失价值的光阴。从精神状态上讲，他们是一批在各种冲突、竞争中慄慄自惧，时刻感受到类似“世纪末”的悲哀与危机的焦灼的都市